

清代京南诸县地方教育浅论

王玉亮

(廊坊师范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有清一代,今廊坊所辖的京南诸县,虽然地处畿辅重地,但地方教育发展状况并不理想。这里既有永定河水患造成的地瘠民贫等天灾原因,又有政扰差繁等人事因素,但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与否才是更深层的根源。

关键词:清代;京南;畿辅;廊坊;地方教育;永定河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210(2015)06-0022-05

今河北省廊坊市所辖固安、霸州、永清、安次(明清时为东安)、香河等县,地处燕山南麓、华北平原北部,东临渤海,西近太行山,中流永定河。自金元定都北京以后,诸县便成为京南畿辅重地。明清以来,北京进一步发展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汇聚了无数达官贵胄、豪商富贾。京南诸县“滨河襟海,北拱神京,固甸服之咽喉而左辅之股肱郡也。天子诞敷文德,被化最先”^①。受京都影响,京南畿辅之地本应是文教昌盛之地,然而有清一代诸县地方教育状况却并不理想。探究清代京南诸县地方教育发展迟缓的原因,既有助于深入认识当时地方教育兴办实情,又有助于认识地方教育发展与当地经济、生态环境、官员重视程度之间的深刻联系。

一、清代京南诸县地方教育兴办概况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府、州、县等地方教育机构一般分为官方的儒学(也称庙学、孔学)和半官方的书院、社学、义学,以及民间的乡学、义塾等(义塾与私塾不同,私塾多为家学,不应属于教学机构)。按照规定,每府、州、县都必须设立官学,每级地方行政只能有一处相应级别的儒学,而且朝廷对不同级别、不同地方儒学的生员数额、教学考试内容以及师生薪酬、津贴等都有明确规定。作为半官方的书院、社学、义学在数量上则不受限制,地方官绅的重视程度几乎完全决定着它们的数量、规模和生存状况。民间乡学、义塾的数量、规模和办学质量,更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认识水平息息相关。

(一)官办学校:儒学

作为官学,与其它地方一样,京南各县儒学都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有专职的学官、固定的薪酬,甚至儒学的工勤人员的编额、待遇也非常明确。如固安县设教谕、训导各1名,俸银各31两5钱2分;设斋夫3名,工食银共36两;膳夫2名,工食银共13两3钱3分3厘;门斗3名,工食银共21两6钱。^②再如生员名额及膳食膏火补助,“文童额进十八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贡,武童额进十五名”^③。安次县“县学额设廪膳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新生每岁科两试各十二名,后又额增三名。武生岁试十二名”^④。“廪生二十名,岁支银一百九十二两”^⑤。由于儒学的所有开支都有地方财政作为保障,所有教职人员的职责都清晰、明确,教学内容、规章制度都相同,所以,不仅京南诸县儒学的开办、运行、管理情况相差无多,而且与直隶其它各地的县学也无二致。

收稿日期:2015-10-27

基金项目:2015年度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无(永)定河与安次县治变迁研究”(2015070);2014年廊坊师范学院重点学科课题“清代河北地方义学教育研究”(LSWY201406)。

作者简介:王玉亮(1973—),男,河北永清人,博士,廊坊师范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河北地方文化史。

①⑤李光照:(乾隆)《东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77、149页。

②郑善述:(康熙)《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82页。

③陈崇砥:(咸丰)《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408页。

④刘钟英:《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4页。

然而,从某一侧面,如儒学建筑的保养、修缮情况,也可以看出各县儒学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儒学的办学质量优劣。儒学建筑往往被称为学宫,地方官员一般都很重视学宫的建设与修缮,如固安县的学宫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以后成化、嘉靖、隆庆、万历、崇祯等年间共9任知县、教谕等有过重修、复建。到了清代,康熙朝5任知县、雍正朝2任知县重修,乾隆和道光年间也曾修缮过学宫。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固安县的多任官员还是非常重视对儒学建筑的维护的。地方官员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兴文教、淳民风,如果作为官学场所的学宫都不能及时修缮,可以想见教育的兴办情况,况且朝廷又有明文规定:“因凡学宫内外,平时扫除、洁净,敬谨防护,如有损坏,急行修理。会典督抚,飭守土官察其境内应修者,守土官计费申报,资部动项葺治。如缙绅生监愿修者,列名以闻,交部议叙”^①。然而,京南诸县并不都像固安县那样,如香河的儒学,自明嘉庆乙卯年训导谭震捐俸修葺后,至民国建立未再有修葺记录。就如当今,各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往往表现在校舍等硬件设施上一样,古代各县儒学建筑的修缮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地教育的受重视程度。

(二)非官方、半官方的教育机构

至于乡学、义塾、书院、社学、义学等非官方、半官方的教育机构,它们并非完全属于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经费也并不由地方财政担负,因此,它们兴办的好坏,更可以充分反映出地方官员和当地民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1.社学

《大清会典》“顺治九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社师,提学查考。雍正元年覆准:州县社学多在城乡,民不能到学,照顾顺治九年例,州县于大乡巨堡各立社学”^②。尽管清初帝王一再要求地方官员兴办社学,然而实情却并不理想,如固安县社学,据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修固安县志载“县乡俱有,今废”,也就是说,距顺治九年(1652)60余年就全部废止停办了。再看安次县,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都记载“社学在西门外,康熙五十四年建”,关于社学的记载都是仅此一句而已,另外几县也大致如此。而直隶永平府,如抚宁县某一处社学,康熙年间知县王文衡置田151亩、知县谭琳捐俸20两增置田50亩。^③知县刘馨捐资修葺社学、知县赵端捐荒地42段共1顷40亩3分7厘。^④随着学田即

办学资金的不断增加,师资力量从王文衡时“塾师一人”发展到了赵端时的“塾师四人”;薪酬从原来的“修金一十二两”增到“每年修金三十两,按季支领”^⑤。可见,抚宁县社学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官员的重视、捐助有着直接的关系。又如保定府束鹿县的某村社学,“生员赵尊珠、乡民董光朝、李春秀等,谢村乡民梁应龙等”,“立社学会,每月一会,入钱百文。公举赵朝翠等掌管出纳子母”。以后陆续增置学田,“岁积租粮”,“充束修,教乡弟子”,以租银“经营子钱,创建馆舍以栖社师”。^⑥该县其它几处村庄社学,也是由当地民众置学田、建馆舍,积极创办起来的。与抚宁、束鹿两县相比,京南诸县社学的兴办就显然逊色多了。有学者曾提出,社学“经费多由官绅捐赠或由学田支持,使得社学带有免费义务教育的性质。社学的这种广泛性、普及性、平民性和义务性特点,是中央太学、府州县儒学及书院、私塾等完全不能比拟的。它在推动基础教育普及深入方面的作用,也是其他教育机构无法替代的”^⑦。这个结论对于京南诸县可能要大打折扣了,京南诸县的社学远没有达到广泛、普及的程度,更没有起到推动基础教育的作用。

2.书院

清初诸帝尤其是雍正帝非常重视并积极推动书院建设。“我朝雍正十一年,诏京省及天下府州县各立书院。主以山长,莫不置膏火,以瞻其身,优奖赏以鼓其志,其制视宋四大书院为尤备。”^⑧在朝廷号召和鼓励之下,各府、州、县也都纷纷重修明代书院或创建书院。然而,从京南诸县县志中很难看出兴办书院的盛况。如咸丰九年(1859)编纂的《固安县志》载:“犹龙书院,在县治东,傍长贞观,今废。”^⑨其实,早在公元1714年编纂的县志中就有同样记载,编纂新志时只是原文抄录,可见官员不仅对书院教育不重视,对修史编志也未能尽心尽力。霸县、永清、香河等县志对本县书院记载或如《固安县志》极其简略,或付之阙如,而《安次县志》也只略述了其书院的沿革而已:“金台书院在县治

①⑨陈崇砥:(咸丰)《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60、422页。

②王昶:(乾隆)《宣化府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52页。

③⑤张上铎、史梦兰:(光绪)《抚宁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63-264、263-265页。

④⑧游智开、史梦兰:《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光绪永平府志》,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5、1388-1389页。

⑥谢道安:《束鹿县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88-89页。

⑦李绪柏:《明清广东的社学》,《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

东街,明万历四十六年知县陆燧建,清雍正中知县张拔改建于小西街,知县李光昭重修,嘉庆二十四年知县陈镇标复建,改名安次书院,今县议会即其故址”^①。相较而言,直隶其它各府县的情况要好得多。如抚宁县有3所书院,县志分别记载了它们的历史变迁、教学运转、官员捐俸置田以创学或助学情况,以及经费的增补、发放和生息管理等^②;《涞水县志》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历任官员不断增建书院房舍,尤其是不断增补书院经费、严格经费管理等情况^③;而《武强县志》则一一记载了官员、乡绅、民众如何捐银、献田、扩建校舍以助书院办学等事^④;唐县的唐岩书院和栾城县的龙冈书院,不仅“延名师,立学规”,还定有规章制度,前者的章程有14条^⑤,后者的章程多达20条^⑥,令人印象深刻,可谓清代直隶书院中管理较完备者。书院与当地的儒学一样都属于本地较高教育机构,在地方教育中甚至起着比儒学更重要的作用。“夫书院所以佐学宫以造士也”,“书院之设,与国中之学等。聚一方之士,肄业于中,以成就其德行道艺,而官师训课之,而升降之。信乎!造士之法,莫良于此矣”。^⑦然而,京南诸县书院办学情况既远不及直隶其它各府县,更不可能实现“佐学宫以造士”的作用。

3. 义学

义学也深受清代帝王重视,“康熙五十二年,覆准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雍正元年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皆改为义学,以广文教”^⑧,”“国朝康熙间命天下州县各立义学,雍正间又申勅州县建义学”^⑨。京南诸县官员的执行情况如何呢?固安县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建北关、柳泉邨、马庄、知子营、牛坨共5处义学,但到咸丰年间都已废止。^⑩香河县于雍正年间在城内东街建立一处义学,后又于光绪年间为回民子弟创办义学两处,民国时就都停办了。^⑪至于安次县,有义学四:“一在县治小西街,后改为书院;一在王里村,一在茨平村,今俱废。一在落堡,亦废”^⑫。这些县志只是记载了各县义学坐落位置,此外并无更多详情。对照直隶其它各县,有许多县创办了多所义学,官绅捐助也非常多,并大多沿续至清末改制。如定兴,自清初至清末光绪朝,前后兴办的义学有20余处,只有少数停办。再如束鹿县有义学10余所,创建者有乡人、武举人、生员和知县。栾城县康熙时“知县王玘志在振兴文教,创立义学十六所,捐俸延师,每学各给地亩有差,以资馆谷,民间子

弟从游者甚众”,道光时“知县桂超万起意兴学,由城及乡先捐后劝所有,先后设立义学”^⑬18所。这些义学除有官绅捐助外,多为本村人捐建。在县域地方教育机构中,深入到乡里、村屯的义学,与设立在城内的儒学、书院和设立于大乡巨堡的社学相比,属于最基层的教育机构。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村落中的乡民子弟,更能向乡村民众推行教化、振肃民风,“学校之设,所以养育人材,书院、义学又以佐学校所不逮也”^⑭。但整体上,京南诸县义学不仅开办数量有限,而且存续时间也较短,对乡村民众推行教化、提升乡民教育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总之,从官办的儒学以及半官方、非官方的书院、社学、义学来看,清代京南诸县地方教育整体并不昌盛。对于这一点,时人已有认识。如香河县,明代时“士习淳正,人材辈出,教育之盛,于斯为极”^⑮,但到清代,进士“不过十余人,其最著者,惟陈则廉一人而已,一时士风为之丕变,然考当时,应童试者,不过百余人,应乡举者不过五十人”^⑯。至于安次县,明朝时“人文蔚起,嘉隆年间科第蝉联,往往甲他郡邑。既遭兵燹,兼受浑河冲决之患,未免摧残,致伤地脉,迄今文运少衰而仕进者鲜矣”^⑰。从两县明清教育盛衰状况对比来看,有清一代京南诸县已是文教不兴了。在霸县“乡间见一读书人,举男女老幼皆以先生呼之,甚至其家中父兄对于旁人亦称我们先生。二十年前(约1912年前后),乡间子弟得一秀才初次到家,不特

①⑫刘钟英:《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579、57页。

②张上龢、史梦兰:(光绪)《抚宁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62页。

③陈杰:(光绪)《涞水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47-248页。

④翟慎行:(道光)《武强县新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77-278页。

⑤陈詠:(光绪)《唐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422页。

⑥⑬陈詠:(同治)《栾城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0、317-318页。

⑦游智开、史梦兰:《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光绪永平府志》,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8-1389页。

⑧王琬:(乾隆)《宣化府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252-253页。

⑨陆福宜、时珍:(光绪)《阜城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03页。

⑩⑭陈崇砥:(咸丰)《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423、217页。

⑪⑮⑯王葆安:《香河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33、233、247页。

⑰李光照:(乾隆)《东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85页。

一家人欢欣异常,即一村合邻村人皆欢迎数里外,从此每一事项则惟先生之命是从。先生一从都邑回家,则必聚而请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项,亦无敢与抗者。自科举停,功名人不出,其视旧功名人,又如彝鼎图书,以为不可多得,尊敬更甚于前”^①。这些记载,从侧面反映出京南地方教育的极度落后。

二、京南诸县教育不兴的原因

(一)自然原因

京南诸县地处永定河下游泛区,永定河原称无定河,只因它没有固定河道,常常泛滥成灾。据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专家刘德泉统计,“金代(1153年)至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834年间,永定河决口、漫溢146次,改道10次,平均每5年就有一次洪灾发生。其中清乾隆元年(1736年)一宣统三年的176年中,发生决口、漫溢49次,平均每3.6年发生一次洪灾。民国存在的38年间,发生决口18次,改道一次,平均每2年就发生1次洪灾”^②。从《明史》和京南诸县的地方志来看,明前中期,永定河主河道从卢沟桥经大兴西部、固安西部、霸州西部,向南汇入新城、雄县一带的白洋淀,在霸州、文安和保定东部一带为患。到明代后期,永定河又回到固安、永清、安次等京南一带。明末清初,永定河的主流从东起武清县城(今天津市武清区城关镇),中经安次县、永清县,西至固安县西部,来回摆动。自1698年开始,清康熙帝加大了筑堤束水的力度,并赐名为“永定河”。筑堤束水虽然有效遏止了河道的频繁摆动,但反而使河道更易于淤高决堤,尤其是在安次、永清两县。如前所述,从明朝每13年发展到清代每3年决堤一次。

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的水患,每每造成田舍淹没,人畜伤亡,民无恒产。水灾过后,淀泊处处,草莽丛生,不仅土质卤碱化,田界也常常混乱,以至有“隔夜不找地界”之说。越发恶化的永定河水患,造成京南诸县愈益贫瘠。康熙四十一年(1702)前,杨朝麟赴任文安,“甫下车,见其原隰污莱,满目荒凉,惻然念之。地瘠民贫,百为俱废,疲敝之状,日甚一日”^③。东安县令李光昭也描述说,“东安地皆沙瘠,间有膏壤,旗庄十处五、六,故其民多贫。永定河自邑之西北流绕东南,每遇淫潦,漫溢田舍,化为藪泽,民益病之”^④。诸县水患频仍,土地贫瘠,使当地极其缺乏发展民生的物质基础,更不要说兴学读书了。

(二)社会因素

京南诸县为畿辅重地,距京师百里之遥,然而,非但没有深受皇恩,反倒倍受烦扰,徭役繁重,八旗圈地,更加重百姓逃离。香河县“惟近畿五百里内,圈占民田,计亩征租,实特别虐政,于是有避免圈占,带地投旗,怀有在内务府纳租者,统计此项地亩,约占全县十分之六”^⑤。进入民国二十余年后,香河县的土地还未清理完。

京南既承明清战乱之余,又是圈地重灾区,人口离散,乡民极其贫困。据县志记载,明朝时安次县原有4611户,天启年间仅存1072户;明洪武初编户44里,后因差役繁重,百姓逃亡,空挂版籍,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县陶栋并为18里。^⑥可见,自明后期便有人口大量逃亡,村庄空户。到顺治元年(1644)全县仍然编户18里,民丁共7532丁,除开豁逃亡、投充人丁共5489丁,实存剩人丁2043丁。到顺治十四年(1657)时实在人丁2407丁。人丁分为九等,上三等(上上、上中、上下)没有,中三等(中上、中中、中下)只7人,下上、下中两等有189人,而下下等人丁则有2211人,九等共征银842两7钱8分。^⑦到雍正二年(1724),安次县的实在人丁有5184丁,共征银1508两2钱9分。^⑧可见,清初时,京南诸县仍然人丁稀少,而且绝大多数是极其贫穷的下等民众。

再看地亩收入,固安县“国朝原额民地四千八十一顷七十六亩七分五厘七毫一丝,内除社学堤占养济院义塚等地一百零八顷七十亩八厘一毫三丝,又除节年圈投去地三千六百一十五顷三十六亩一分五厘八毫”,“实在征粮地六百六十五顷五十亩七分八厘一毫……本县实征地粮银二千九百一十六两九钱二分八厘一毫四忽九微六纤八沙二尘一渺二漠”^⑨。且不论全县被圈地亩和王公贵族所占庄田数量多少,仅就全县民田的4000余顷而言,只600余顷承担税粮,收缴的租银不到3000两。

①刘廷昌:《霸县新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71页。

②刘德泉:《永定河水利工程与水文化》,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07-06-25。

③陈桢:《文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018页。

④李光照:(乾隆)《东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88页。

⑤王葆安:《香河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46页。

⑥⑦⑧刘钟英:《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101-102、104-105、115页。

⑨郑善述:(康熙)《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8-79页。

综览京南诸县清初人丁、地亩财政收入,每县至多在万两上下,还要起运(上缴国库)大半。固安县“自圈占之后,恒产寥寥,专籍他邑拨补,以供赋税,常苦缓不及时,且徭役之繁,递马之敝,每坐叹拊循调剂之无术耳!”^①其财政如此困顿,加上官员疲于应付繁重徭役和驿递迎往事务,因此很难有财力和精力关注书院、社学、义学等,而民间“恒产寥寥”,甚至没有世家望族,执笔修志者都感慨“吾乡风俗朴儉,自清代来,县中无一世家巨族,故境内藏书家绝渺,欲问乡邦故实,每苦于文献无征”^②。

总之,京南诸县地瘠民贫,民无恒业,地方财政收入也极其可怜。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官绅乡民对地方教育的投入,也是京南诸县绝少官民捐银、献田办学、助学的重要原因。有清一代,凡是地方教育兴办良好、培育贤才多的府、州、县,其地方志一般都会大书特书,详加转载,而兴办不力或水平一般者,则缺记或略记。因此,从诸地方志有关记载的详略,也可以反映出其地方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与兴办水平。京南诸县志对地方教育情况记载的缺略,也恰是当地教育不兴、官员不为的侧证。

结 论

针对京南永定河泛区诸县的地方教育,康熙五十四年(1715)还曾专发上谕给直隶巡抚赵弘燮,“朕每年春间行幸水淀,近见民生虽不能家给人足,比之往时似觉差胜,但村庄之中诵读尚少。朕思移风易俗,莫过读书,非此无可上进,况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于穷乡僻野,皆立义学,延师教读,以勉励孝弟,可望成人矣。尔即遍示村庄,皆

知朕崇文好学之深意,特谕”^③。尽管帝王特意关注京南诸县的地方教育,甚至谕示直隶巡抚遵行照办,然而实际效果如前所述,反倒不如直隶其它府县。这其中确实有上述永定河水患、土地贫瘠、湖泊洼淀纵横等自然原因和战乱、赋役沉重、圈地占田等社会原因,但对照直隶其它各府诸县,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政令不行,官员无为。

前述永平府的抚宁县、保定府的定兴县、祁州束鹿县、易州涞水县和真定府的栾城县,也有地瘠民贫,也有赋役差徭苛繁,也经战火、圈地,然而地方教育却办得有声有色。这些府县,绝大多数是地方官员积极作为,率先倡义。虽然地方官,尤其是县令,个人捐资、献田给书院、社学、义学,并不是职责内的事情,然而以知县为首的官员,他们倡捐、助学的行为,确实引领了一方绅民踊跃捐资献田,使各学经费充盈起来,从而广布兴教重学之风。对比河北诸多县志,重视地方教育的县域,往往会不厌其详地一一记载大量的儒学田、书院田、社学田、义学田,以及每块田亩数量、坐落、捐献人的身份、姓名、捐献时间,尤其突出知县、教谕等官员的功德。情况相反的,则记载极为粗略。这充分说明了地方官员在重学之风、捐助之行、教育之兴三者之间良性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总之,造成京南各县教育不兴的状况,地瘠民贫、天灾政扰等都是外因,地方官员和民众缺乏重视才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关键内因。

①郑善述:《康熙》《固安县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75页。

②贾廷琳编:《固安文献志》,徐世昌鉴定,固安公署排印本,1927年版,第47页。

③刘钟英:《安次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68页。

Local Education in the Counties to the South of Beij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ANG Yu-lia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eas referring to the present coun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Langfang are located in the Jifu areas. The situation was not ide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ducation in these coun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was because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barren fields and poor people due to the Yongding River flooding, and human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interferences and heavy servitudes. However, neglect of education by the local officials is the root cause.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southern Beijing; Jifu; Langfang; local education; Yongding River